

# 鲁迅对“儒性”“儒根”的批判思想研究

曾颖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中文学院 广州 510420

**摘要:** 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在他的文学创作中,曾不止一次表达了对儒家文化的批评和反思。纵观其后期几篇历史小说,既有对儒学思想中庸虚伪一面的批评,也不惜笔墨表露对于孔子治世思想的认可。这种矛盾的态度根源于新旧更迭的历史背景,亦是鲁迅内心自我挣扎的一面明镜,这种态度更多是对儒家思想中“儒性”“儒根”的批判,而非全盘否定儒家文化。

## Lu Xun's Critical Thought Study of “Confucianism” and “Confucian Root”

Ying Zeng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Abstract:** As one of the advocates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Lu Xun has expressed his criticism and reflection on the Confucian culture more than once in his literary creation. Throughout his later historical novels, he not only criticize the hypocritical side of Confucianism, but also express the recognition of Confucius' thought of governing the world. This contradictory attitude is rooted in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change of the old and the new, and it is also a mirror of Lu Xun's inner self-struggle. This attitude is more a criticism of the “Confucianism” and “Confucian roots” in Confucianism, rather than a complete denial of Confucian culture.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及现代文学奠基人之一的鲁迅,不仅给全世界文学贡献了多种民族形式的、不可模仿的作品,他的讽刺与幽默在兼具人类共性之余带着有着不可模仿的民族特点。在鲁迅的诸多作品中,都不乏对中国诸子百家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如《故事新编》中的《非攻》《起死》《出关》,于三家“显学”各有褒贬,弃儒道而扬墨。对于墨家,他评价为“尚夏道,兼爱,尚同,非古之礼乐,亦非儒”,鲁迅对墨家的倾心更多是崇尚逞匹夫之勇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兼爱”以及“赴汤蹈火”宗教祭祀般的献身精神,非其“背周道而用夏政”的治学思想;对于儒家,鲁迅虽尊孔,但丝毫未“吝啬”批驳孔学的中庸之道,尽管鉴于新文化历史任务裹挟了些功利的黑白论,鲁迅对儒家“吃人”的“儒性”“儒根”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攻讦,可以说鲁迅眼

中的儒家是顽滞的、腐败的;对于道家,他更是直截了当地将“小国寡民”“避世”归结为殃及国民安危的精神毒药,称此为“不撻人心”,无所作为;对于法家,鲁迅则基于辩证法思想进行剖析,并以王安石改革举例,肯定了法家的积极作用。

在这些百家文化中,鲁迅发扬“扬弃”的方法论,将旧文化中迂腐的君臣思想、懦弱的中庸自保劣根性予以毫不留情的抨击,对于那些看似大胆超前社会发展的个人英雄主义予以讴歌与赞美。于是,两千年的儒家文化,便被作为“杀鸡儆猴”的典型范例,被无数个新文化运动的小说原型所冠帽批斗。

### 一、对儒家中庸之道的批判

鲁迅对于儒家文化的看法是令人玩味的。首先,鲁迅对孔子和儒家从来都不是反对哲学意义上的儒家,而是儒家背后代表的旧时代组织形式、生活方式,也就是所谓的“儒根”、“儒性”。鲁迅先生曾在《无声的中国》一文中回应过这个观点: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

**作者简介:** 曾颖(2000.11—),女,汉族,广东东莞人,本科,学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

倘若从主观上说是因为“儒根”让中国人对事物发展保持不偏不倚的缓慢态度，那么鲁迅在承认“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一点后，应该毫不留情地驳斥这种荒谬。但很显然，鲁迅本身就避免不开“调和”的习惯，一方面抨击封建专制文化残害人性，一方面践行积极入世的儒学思想，他恨道家无特操、无是非观的“看客”本性，却又在老庄的超脱虚幻中寻求慰藉和寄托。可见，鲁迅在自我“撕扯”，他同样深受传统文化浸润。中庸是思想上的一次“偷懒”，是思维里的惰性，区别于辩证法，中庸之道强调盲目的调和，掩盖斗争性，表面上看似完美解决了问题，实际上保守至极不发表任何意见，这与老子的“无为思想”其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鲁迅以白话文为例来说明中国人并不是骨子里想要调和，而在于这个社会是否有“激烈的主张”。“儒生”并不可耻，也不会严肃到“悲哀可怜”的夸张境地，实质上大部分中国改革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发声渠道的闭塞，这也是激烈的主张被掩盖的原因。在《狂人日记》里，鲁迅对整个社会体制的嘲讽还混杂了儒家理学戕害人心的斥责：

四千年来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

打着孔孟之道程朱理学中的“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导致吃人社会的根本推力，也是鲁迅重点批判的对象。看似中国社会变革、改革派与守旧派的冲突碰撞导致灾祸发生，看似西方文化铁骑对中国旧学派的践踏，其真正根源在于过度强调社会良俗而拘束了人性发展，这种压迫感使中国社会从士大夫官僚开始形成的歪风邪气，传递给底层目不识丁的迂腐百姓，于是人吃人不可怕，可怕的是，别人都在吃，你不吃，最终成为社会的异类结果还是被人吃。封建礼教束缚压抑天性的同时，还缓慢地腐蚀人心，使其变得麻木不仁，失去反抗、反思的能力而纷纷向现实投降。鲁迅深谙“天理”之虚伪，披露了儒学吃人的实质。

## 二、对士文化传统的批判

中国的“士”传统已经延续千年之久，“士”的最初含义见《说文解字》：“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从十。”“士”本义为“事”，表示善于做事。儒家创始人孔子将其解释为“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sup>[1]</sup>主张知识分子从政乃行“道”，如果只求个人财富而仕宦，孔子认为是可耻的<sup>[2]</sup>。自秦汉之初，

士文化逐步向孔子所鄙弃的朝向发展，与“官”结合，隋唐兴科举后，士、士人等词特指具有入任意向的知识阶层。中国士人的“为官”情结由来已久，科举制度更成为仕途的跳板，甚至悖离原始儒教的“士”理念，走入了歧途。鲁迅所鞭挞的正是科举语境下的功利和虚伪，是求知外衣下唯名利论的病态扭曲。

《白光》和《孔乙己》塑造的两位主人公人生经历相似，同是科举制度的牺牲品与殉葬者，散发着腐朽封建士大夫的气息。孔乙己半生不举，被咸亨酒店的酒客讥笑唾弃，陈士成连试十六次无一中榜，内心的苦恨、贪婪、绝望将他逼成了孤魂般的精神病犯，只剩一副空壳。作为失意知识分子，科举失败意味着他们将被社会摒弃，能否中举成为衡量读书人价值的唯一标准，多年含辛茹苦被视而不见，反倒受封建文化的无情打击，受尽世人凉薄。这种深植千年的封建教育体系蛀蚀着一代代底层知识分子，读书人出路狭窄，作官是唯一选择，这种社会风气造就了孔、陈二人对科考的狂热痴迷。他们以为读圣贤之书、习五经乃天经地义，从未反抗、质疑或思考科举背后的价值逻辑，体现了中国士人的思想局限性。其次，作者对待二者的情感也有所不同，鲁迅以一颗人道主义的悲悯之心观照孔乙己的悲惨遭际，酒店伙计“我”是具有自省、反思意识的旁观者，因此孔乙己并非一个十足可憎的人物。例如他从不拖欠酒钱、将为数不多的茴香豆分给孩子们、教“我”识辨汉字，相较陈士成，孔乙己是真正的读书人，其热爱知识已达近乎信仰的程度。小说以悲喜交融的风格叙述孔乙己一生，这背后蕴含了不忍、怜悯，以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白光》尽管作者无用贬词，但冷隽讽刺的笔触下呈现出一种全然不同的感受。在叙述上，作者采用了全知视角，对陈士成的命运展开客观陈述，无疑嘲讽多于同情，鲁迅视陈士成如视病患一样，精神信仰是空虚的，他迂腐麻木，骨子里不学无术，只有功名利禄。最后，追逐“浮财”的陈士成终沦为了一具“浮尸”。

鲁迅笔下的人物是复杂的，他们身上既折射出鲁迅对科举制度的控诉，也包含对底层人民软弱的悲悯和不甘，本质上都是对中国人身上“儒性”“儒根”的批驳。他从士文化传统千年以来循环往复的道德内省模式挣脱出来，开始反思士阶层存留已久的“道不行”<sup>[3]</sup>，从真正意义上突破“儒根”“儒性”。

## 三、对“仁义”虚伪性的批判

鲁迅对儒学的态度从代表作《出关》《非攻》中的情节也值得深思。例如小说《出关》前半部分写孔老相争时写道：

“时，是不能留的；道，是不能塞的。只要得了道，

什么都行，可是如果失掉了，那就什么都不行。”

当孔子向他诉说服务于各国主子无望时，老子顿生灵气，对孔子大谈“只要得了道，什么都行，可是如果失掉了，那就什么都不行”。不着实际的教导使渴望“入世”的孔子“亡魂落魄”。鲁迅一针见血地揭穿了老子思想中的消极避世对造成整个民族不思进取、如同槁木的负面影响，中国若要生存与现代社会并获得竞争力，必须要敢于抗争，从现实出发，而非选择逃避。这也与其主张的救世方法截然不同，他赞扬摩罗诗人般的精神战士，痛感道家的不作为，国民只有“沉痛著大之声，撻其后人，使之兴起”，才能挽中华民族于水火。但是，鲁迅并没有批评孔子，而是在两者论辩中，给出了一个让人玩味的说辞。鲁迅对孔子的评价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而老子却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从两者的比较中，鲁迅让读者看出谁积极，谁消极，老子实质隐射社会历史主体能动性的匮乏，所谓“不争”、将“不作为”合理化，正是以“立言”为要事和能事的中国知识人的通病。那么，鲁迅是在夸耀儒家悬壶济世的功德吗？并不是。孔胜老败的结局可也许是鲁迅有意为之，带有漫画性的、非孔的色彩。一是孔子的“以柔进取”实为“外柔内险”，将看似异类的老子逼出函谷关，这里不禁让人联想到鲁迅自身和学生高长虹之间的纠葛。结合三十年代时期文坛政治背景，鲁迅在当时不被大众理解、备受排挤，可见老子身上带有鲁迅个人经验的投射<sup>[4]</sup>，老子指涉自己，以孔子为首的儒家群体则是“庸众”。不过这一说法一直颇具争议。二是孔子（歧变后的孔学）亦或者整个儒家群体所谓的济世，实际上是图取功名，自诩正派，虽然不能否认他们热心朝政的欲望，但他们的出发点永远是先王或是存乎于“天理”的道义美名。而这些是鲁迅最无法谅解的“儒根”性，这些口口声声的“仁义道德”实际上忽略了底层人民的人性，让那些人即使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依然要自诩清高。这也印证了鲁迅在《孔乙己》中讽刺的一样：

“孔乙己没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但他在我们店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虽然间或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从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

儒家所教出来的书生，除了读书没有自食其力的能力，暗地虚伪自欺欺人却又在台面上伪装道貌岸然，俨然一派光明君子。一旦让这些书生有朝一日求取功名，登上庙堂，却又是治国能臣，孔孟遗风，这是荒谬的。鲁迅素以战士自居，他的笔触永远是横眉冷对、嫉恶如仇，底下的“儒根”、“儒性”统统要给他揪出来。而与之对立

的旗杆人物，自然是同期百家显学中的墨家、法家。在《非攻》一文，这种快人快语得风格畅述得淋漓尽致：

“唉唉，你们儒者，说话称着尧舜，做事却要学猪狗，可怜，可怜！”墨子说着，站了起来，匆匆的跑到厨下去了，一面说：“你不懂我的意思……”

鲁迅在这篇小说的创作过程里，一反惯用的创作方法，直接以革命现实主义的笔触塑造了一个反抗侵略的“中国的脊梁”式的墨子形象，在表达御侮图强的坚定信心 and “明战术”“重实力”的战略思想及智慧同时，也在讥讽那些儒生的虚伪和蠢钝。同样，鲁迅的论争矛头永远指向“儒根”“儒性”，他的非儒思想不是全盘的，但绝对是彻底的，他要剥除的一定是骨头里的骨刺，而不是腐肉。儒家传统一直贯穿整个封建体制时期，所以不能因此就否定儒家学说的优点，比如儒家倡导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有仁的思想，对于个人修养同样大有裨益。但鲁迅所斗争的，是千年未变的陈腐老调，是其中的异变和糟粕，这才是他大加挞伐的。于是，“儒根”“儒性”这根辫子不剪掉，社会永远止步不前。

#### 四、结语

早期十年求学阶段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叔本华等思想影响，以及师从“反满”斗士章太炎的经历造就了鲁迅“首在审己，亦必知人”的精神特征，意在于开出一条以“立人”为旨的启蒙新路。正如他所刻画的每个人物、故事都带着强烈的理性主义和自我审视的意味。然而，鲁迅未全然抛弃传统文化的精华，而是以清醒的姿态挣脱“儒性”背后根植千年的腐化思维模式，在有限的历史语境下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 参考文献：

- [1] 论语译注[M]. 中华书局，杨伯峻译注，1998
- [2] 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M]. 江苏人民出版社，余英时著，1989-6
- [3] 符杰祥.“道”与“路”的千年困结——鲁迅对中国士文化传统的现代性批判[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02）：110-115.
- [4] 高远东. 论鲁迅对道家的拒绝——以《故事新编》的相关小说为中心[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01）：93-110.
- [5] 鲁迅全集[M]. 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2005
- [6] 杨肇焱. 鲁迅对儒家思想的批判继承[C]// 孔学研究（第三辑）——云南孔子学术研究会海峡两岸第二次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996.
- [7] 许清友. 鲁迅对儒家思想的另一面——兼论鲁迅的孔子观[J].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5（1）：6.